

“不接地气”的通识教育，真的需要改良了



徐英瑾

国内大学传统上以专业教育见长，以通识教育见短——这似乎是近几年

从事通识教育的同仁的普遍见解，也是推行中国版通识教育的主要动机。

问题在于，有关通识教育的必要性，似乎一直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鲜有系统性的反思。

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教育所承担的巨大教学负担之间，必须有所取舍

通识教育往往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文科生多上一点理科科目”“理科生多上一点文科科目”，并由此成为大学既有学科体系在授课对象方面的扩张。

但严格地说，这种做法比较粗糙。笔者虽然原则上也赞成文、理科学生得多了解对方在做什么，但彼此了解的基础，应该是一些具有共通性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满足“通识教育”的形式要求。

举个类似的例子来说。虽然我们反对对大龄未婚女积极相亲找对象，但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简单粗暴地配对。这道理放到文理互通这个领域，也是说得通的。一名有机化学专业的学生，为何一定要对《大学》《中庸》有深刻研读？一个搞数论的学生为何一定要背无数首唐诗？这些本事，除了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颇具人文素养之外，很难说在其长远的职业发展中有何本质帮助。

然而，一名为法院建立自动化推理系统的计算机专家，确实需要懂点法学常识；一位试图研究曹操家族血缘遗传路线图的遗传学专家，也得具备一定的文言文阅读水平，有能力通

抓住“实战性”与“接地气”目标，向大学生提供新通识教育方案

从当下实际出发，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紧紧抓住“实战性”与“接地气”这个目标，向大学生提供文理兼通、且对日后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助益的新通识教育方案。

通识教育首先要突出的，是逻辑思维训练。逻辑思维或批判性思维训练对所有学科都具有普适性，却不是大多数中国大学新生的必修课。我遇到过不少理科朋友，在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时候，就基本不讲逻辑了。此外，对于自认为逻辑感不错却缺乏系统逻辑训练的人来说，是否能够在复杂的三段论推理中遵循“中项必周延”等微妙的逻辑规则，也很难说。

其次是修辞学训练。修辞学这门学问，研究的是怎样的话在怎样的语境下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修辞学在西方的鼻祖乃是亚里士多德，可现在的通识教育往往强调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却不强调出于同一作者、实用价值更高的《修辞学》，殊为可惜。

现在，一些大学纷纷开始要求部分文科生学习微积分，而实际上对文科更为实用的数理知识乃是统计学基础。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使用统计学手段，而且统计推理的方法正在向某些新锐哲学分支渗透，实验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谬误不仅与逻辑相关，也与统计学相关。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训练并非目前通识教育的核心部分。

在笔者看来，除了上面几个部分，各校的通识教育还可纳入以下板块：

1. 认知心理学入门

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中最

与曹氏家族有关的古代文献。

换言之，泛泛层面上的文理互通缺乏“实战价值”的，而真正能够兑现为实际科研成果的，则是特定文科的特定路径与特定理科的特定路径之间的“精准对接”。不幸的是，大而泛之的经典阅读计划，往往难以提供此类“精准对接”。

当然，部分学术同行或许会认为上述意见过于功利。但大学本科一共才四年时间，屈指数来，第一年熟悉大学教育环境，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第三年刚刚找到入门的感觉，第四年就要忙着找工作，再刨去中间参加社团、社会实践和谈恋爱的时间，青年学子究竟还有多少时间熟悉中西人文基础经典，畅游于人类先贤思想的海洋呢？

笔者在大学教授西方哲学与科学哲学。坦率地说，很多哲学专业的学生到本科毕业也不具备有关黑格尔、胡塞尔哲学等艰深哲学体系的入门级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能够对非人文专业的学生提出更高要求吗？

因此，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教育所承担的巨大教学负担之间，我们必须有所取舍。

“硬核”的部分，却与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亦在一定程度上与神经科学有交叉。对于认知心理学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理解文科交融的现实案例，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

2. 新闻英语翻译训练

大学英语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实用性不强，对于经典英语作家的解读难以迅速提高学生理解英语报刊的能力。大学英语教育应当朝着科技英语、新闻英语的方向调整，而将文学类英语阅读留给外文系的专业学生。

3. 世界历史、地理知识

缺乏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素养，是当下大学教育缺失的另一个维度。仅仅让学生阅读古代作家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作品，并不能帮助他们读懂今天的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托克维尔的阅读也无法帮助学生迅速理解“黄背心”运动的本质。以最有效的方式补足这些知识短板，这是通识教育应该考虑的问题。

4. 职业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

伦理学是一门很精深的学问，更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讨论与职业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问题。这样，理科、工科与医科学生更容易从相关案例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要执行如上通识教育方案，显然需要大学管理层重新调配既有的教学资源，而不能被既有的各系教师的学术偏好“牵着鼻子走”。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观点汇

通识课不能是“甜点”，有一部分就该“硬梆梆”

以前有种说法，不要让通识课变成“甜点”，要以专业课的精神来打磨通识课。对此，我深以为然。通识课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是“硬梆梆”的，就是说通识课对人是有训练、有提升的，对人的整个生活历程和心智发展有重要影响。

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让你戴上一副眼镜，让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让你看见从前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一名文史哲专业的学生，通过了解生命科学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世界观，学会了用不同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比如一位环境或能源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一门伦理学课程，突然发现原来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严肃且有着复杂伦理学意味的问题，开始思考“如果大气层藏污纳垢的能力也是一种资源，该如何在不同人群和世代之间进行分配”等问题。

这就是通识课的作用：它使你开眼，使你认识到不同学科是有智识与尊严的，使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面相。而这样的训练必须要有足够的思维和智力含量才行，仅仅让学生听得高兴是不会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至少一部分通识课应该是有挑战性、有训练量的。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长彭刚

职业教育仅有“屠龙之技”不够，也要引入通识教育

为什么有些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有人认为是观念问题，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其实根源是在产业结构调整非常迅速的条件下，旧的岗位不断消失，新的岗位不断被创造出来。如果你花了几年时间学习一项技能，可当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需要这个技能的工作没有了，那你不就等于学了一个“屠龙之技”吗？

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因噎废食，不发展职业教育，而应在职业技能教育中，对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技能进行选择，要有前瞻性，要做战略判断。同时，在职业教育中，应加强通识性教育。不能因为是职业教育，就只教技能，还要教给学生学习能力等软技能和通用性知识。这样，哪怕未来这个工作没了，他们仍具备学习和掌握其它技能的能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政府做出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决定很了不起，但接下来还需付出更大努力，才能让这个决定真正变成惠及民生、与中国未来发展紧密结合的一项战略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摘自中国网、“复旦通识教育”微信公众号等)

校园新观察

透物见史，小众的考古学“火”了

本报记者 朱颖婕

“为了纪念入学40周年，请朋友帮俺特别订购了一批班酒。”这两天，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高蒙河在微信上得意洋洋地晒出一瓶白身蓝字的茅台。“吉林大学考古系78级专用酒”几个

字，勾连起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那是专属于早期考古学子的求学时代，也是考古全靠“洛阳铲、软毛刷”的时代。

近年来，随着大量以文物为设计灵感的文创产品的出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蕴含在考古文明中的文化重量和传统审美，在今天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考古这门看似离大众很远的学科，也逐渐脱离了此前的刻板形象，正以各种形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考古学一开始就不能算是纯粹的“文科”，它强调考古挖掘技术，因此需要师生有一定的理工科基础。那时，考古学的学科形态比较传统，也就是行内人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

大学四年间，高蒙河和同学们花了一年半时间在野外工作，足迹遍布河北、山西等地。正是在那些周而复始乃至寂寞枯燥的发现和和研究中，他们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田野考古本事，“等我毕业的时候，已经可以独立带着一支考古队完成野外工作了”。

高蒙河回忆，当时每到一处进行考古发现，就意味着至少有大半个月需要“与世隔绝”。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也没有广播、报纸，他们常常两人一组，背起猪油和挂面就出发。“走到哪里是哪里，碰到风雪天气，军用罗盘都不一定好使，只能硬着头皮摸黑走，找老乡家借住。”老乡家并不厚实的被子、屋里昏暗的灯光，甚至成群的虱子，回忆起来满是人情的味道。“现在想想都是财富。”高蒙河这样说。

“与世隔绝几个月”曾是考古人的常态

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也没有广播、报纸，他们常常两人一组，背起猪油和挂面就出发

“1978年，我考上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40年过去了，高蒙河对往昔的求学生活依然记忆犹新。他记得，当年自己报考的第一专业是哲学，第二专业是历史，由于他的历史分数特别高，就被当时历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考古学优先录取了，“那个时候搞不懂考古到底是干嘛的，说起来，有些阴阳差错”。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至今已走过了几百年历程。19世纪时，“考古”成为世界通用的学科名称。在我国，宋代兴起的金石学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正式起步。其中，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发掘和记录方法，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

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之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相继设立考古专业，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如今，全国开设考古、文博专业的高校已超过50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明是北大1952年创建考古专业后的第一届学生，入学那年他26岁，已是劳动局干部。“我们那时一共可以填六个志愿，我只报了三个：第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个北京大学哲学系。按我的想法，考就考北大，要考不上就好好工作。”结果，高明很幸运地被北大考古专业录取了。

当时北大的考古专业由北大历史系、中科院考古所和文化部文物局三个单位组成。新建立的考古专业“摊子”虽小，聘请来开课的教员却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殷周考古是郭宝钧，秦汉考古

有人为猎奇有趣，有人因痴迷而向往

如今的学生不太有野外考古的机会，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考古、文博专业的初心也和前辈有所不同

光阴流转，时移世易。随着考古学的学科形态趋于现代和多元，如今的考古学子不太有野外考古的机会，即便去，考古工地的设施条件也跟酒店差不了多少。而他们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考古、文博专业的初心，也和前辈有所不同。

复旦大学文博系2017届硕士生谢珂笑着说，自己学考古是“入了坑”。事实上，高考那会儿，她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志愿才是博物馆学。

“入学时想得比较简单，就希望读个大学，毕业后安心回老家，到高中当

个政治老师。”而选择文博的理由只能用“鬼使神差”来形容。“我一开始以为读这个专业每天会接触古文物，朋友和家人更是问过我，学考古的人是不是就是‘官方盗墓者’‘现代摸金校尉’。但那时我只觉得，‘诶，博物馆学？博物馆学专业是啥？是每天去接触古文物的吗？听着好像好奇、好向往的样子！’”

高考尘埃落定，谢珂进入了江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她说，大一那年，学校给新生提供了一次转专业的机会，班里32个人中，15个人提交了申请，但她从头到尾没转。和她一样留下来的

人，或是抱着一腔好奇，或是捧着一颗真心，当然还有些奇奇怪怪的理由。比如，认为这个专业可以“周游列国”，而且“不用学高数”。

大三期间，谢珂开始认真思考毕业后的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以及这个社会需要自己干什么。思虑再三，她决定报考复旦大学。除了复旦文博名声在外的缘故，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好了，要做公众考古。”

回忆六年的文博学习生涯，谢珂和同学们很少有“蓬头垢面发掘、研究”“回到小黑屋里整理发现”的经历，迎接他们的，反而是多样化的实践训练。

她曾参与过2016年江苏苏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调研工作，以及良渚博物院、陕西博物馆等遗址、场馆的改陈工作等。对她来说，现在从事策展工作，就是在公众考古的范畴发光发热。这个“鬼使神差”的开端，最终成就了一个“如愿以偿”的理想。

当代考古学意在培养“复合型人才”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考古文博人才，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

从传统的学科定义来看，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的的一门学科。它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科学，更是我们看待世界、多维度了解文化的一种方式。经过数十年的学科发展，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了若干分支。如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田野考古学，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勘探、调查、分析和研究的科技考古学，以及艺术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环境考古等各类专门领域的考古学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考古文博人才，在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中，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科人才培养

方案中，三分之一的课程为实践课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映福说，博物馆专业学生可以依托学校博物馆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同时，学校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均建有文博和考古实训基地，以满足学生实践的需求。此外，学校还与东南亚等国家展开了关系密切的学术交流，为学生“走出去”提供了平台。

“考古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接近历史的可能性，更启示和引导今天的我们了解过去和自己，从而更好地思考走向何方，以及如何让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在谢珂看来，这正是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和当代考古人的责任所在。

